

集体欢腾的产生机制、情境特征及其积极心理效应

段颖 尹可丽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昆明 650500)

摘要 集体欢腾这一概念源自涂尔干的社会理论, 是一种由集体集会引发的强烈共同情绪体验。当前心理学相关研究认为, 集体欢腾不仅是强烈的共同情绪体验, 而且是感知情绪同步的过程, 更是联系感与神圣感结合的社会联结与自我扩张感。集体欢腾广泛存在于传统的宗教仪式和世俗生活中, 也因网络突破了群体“身体共在”的条件而出现了线上集体欢腾这一新类型。集体欢腾的产生机制涉及到多维的心理与行为、情境及个体特质等因素, 而当下的研究证据较为一致地揭示了集体欢腾不仅能够带来积极情绪体验, 增强个体的归属感和促进心理健康, 还能提升群体认同和凝聚力, 强化群体规范。未来研究需揭示其自上而下的情绪趋同机制, 深入考察线上集体欢腾的产生机制, 关注其潜在的消极影响及文化心理效应, 并探索其应用路径。

关键词 集体欢腾, 共同情绪体验, 感知情绪同步, 群体认同, 社会联结

分类号 B849: C91

不论是亲身经历还是观看视频, 我们常见这样的场景——演唱会上, 万人随节奏跃动, 所有人的面庞都洋溢着欢愉与陶醉, 眼神在不经意间交汇, 在这一刻人们共享着一种深刻的集体情感。欢笑、呐喊、歌声交织成涌动的海潮, 个体的边界渐渐消融, 快乐与能量彼此传递, 激荡出深刻的共鸣。这种瞬间的联结, 不仅是身体上的同步, 更是情感与精神上的共同升华,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停滞, 世界只剩下集体的欢腾。

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简称“CE”)是一种由集体集会(Collective Assembly)引发的强烈共同情绪体验, 是集体集会的核心(Rimé & Páez, 2023)。在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 集体集会承载着人类的文化, 也见证了时间的变迁。集体欢腾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 广泛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 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宗教仪式及类似的集体活动(Labaree, 1959; Lambert, 1993)。集体欢腾可能发生在集体仪式中, 如渡火仪式(Xygalatas et al., 2011)、仪式庆典(Plancke, 2014), 也可能发生在集体活动中, 如大型文化聚会(Páez et al., 2015)、大型体育赛事

(Bravo et al., 2020), 甚至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 如看电影(Gabriel et al., 2020)。作为一种可迅速建立社会联结的心理过程, 集体欢腾能够对当前个体化趋势加剧与孤独感普遍增强(Bu et al., 2020; Nowland et al., 2017)等问题起到有效缓解作用。它不仅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更是推动个体生存与幸福, 并带来积极心理效应的重要力量(Naidu et al., 2023; Pizarro et al., 2022; Zumeta et al., 2020)。

20 世纪初, 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首次提出“集体欢腾”这一概念。他认为集体欢腾是社会团结的核心, 能够增强群体凝聚力并塑造社会规范(涂尔干, 2011), 但心理学聚焦个体主观体验与内在心理过程, 无法揭示社会现象本质(迪尔凯姆, 1995)¹。尽管这一理论对社会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却长期被心理学科忽视。直到 21 世纪初, 集体欢腾才在集体情感研究中重新获得关注(Rimé & Páez, 2023)并展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Chung et al., 2023; Draper, 2014; Krauss, 2018; Serazio, 2013; Williams, 2020)。

收稿日期: 2025-09-04
通信作者: 尹可丽, E-mail: yayasles@163.com

¹ 迪尔凯姆即涂尔干, 本文根据所参考书籍的作者名称来引用。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为心理学与涂尔干理论的对话创造了条件。集体欢腾具有积极的社会心理效应,尤其对心理健康具有特殊价值(Páez et al., 2015; Gabriel et al., 2017, 2020),当前一些研究者将其纳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从而实现了与涂尔干理论的理论对接与深化。基于涂尔干理论的观点,本文深入阐述和分析当下心理学研究如何拓展集体欢腾的内涵,如何阐释其产生机制、发生情境及积极心理效应。厘清集体欢腾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对个体与群体心理互动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为缓解心理危机、促进人类幸福提供新视角。

1 集体欢腾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

1.1 集体欢腾的内涵

涂尔干(2011)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1912年)中,借鉴了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和F.J.吉兰(F.J. Gillen)的研究,将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原始宗教仪式,并提出“集体欢腾”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他认为,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集体互动和共同行为表达的情绪会引发强烈共鸣,使个体进入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情绪表现和对外部刺激的敏感性增强,而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回应形成了情绪的累积与放大效应:

“一旦他们来到一起,由于集合而形成的一股如电的激流就迅速使之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所有人的内心都向外部印象充分敞开,想表达的情感都可以不受阻拦。每个人都对他人做出回应,同时也被他人所回应。最初的冲动就这样推进、加

剧,犹如下落的雪崩一样在不断地增强。”(p. 297)

心理学研究者从共同情绪体验的强化,到情绪同步的感知,再到联系感与神圣感的融合,探究了涂尔干对集体欢腾的界定(如表1所示)。

从情绪情感角度而言,集体欢腾表现为强烈的共同情绪体验。Rimé和Páez(2023)认为,集体欢腾是一种高强度的共同情绪状态,即个体在参加集体活动时,因共同情绪体验及个体间情绪的相互激活与持续放大而形成情绪状态。通常出现在大型集体活动中,是一种强烈的积极情绪体验(Hopkins et al., 2016)。当个体在集体活动中能够表达其集体身份并感受到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时,这种体验便会被激发。Pizarro等人(2022)强调这种体验的核心特征包括注意力、情绪和行为趋同。这些特征共同促使参与者在集体活动中感受到超越日常的情绪体验,从而增强了与他人的情绪共鸣和一致感。这种共同情绪体验的激活是集体欢腾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础。值得关注的是,集体欢腾不是一种特定的情绪(Pizarro et al., 2022),它既涉及基本情绪,也涉及更复杂的情绪体验,如敬畏、集体自豪感(Rimé & Páez, 2023)。尽管集体欢腾大多与积极情绪唤起有关,但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与消极情绪唤起有关。例如,在悲伤事件(如哀悼仪式)中,个体间深沉悲痛的情绪互动与共鸣可能会形成集体欢腾,并且这种集体欢腾与节日宴会上产生的集体欢腾相同(涂尔干, 2011; Pizarro et al., 2022)。Gabriel等人(2016, 2020)强调,消极的群体行为也会产生集体欢腾,但是它们发生的频率比较低,如灾难或恐怖袭击(Garcia & Rimé, 2019)。换句话说,集体欢腾与唤起的情绪类型无关,关键在于情绪的共享互动。

表1 集体欢腾的内涵

视角	内涵	学者(年份)
情绪	一种强烈的积极情绪体验	Hopkins et al., 2016
	共同情绪的经历,情绪相互激活与放大的状态,是一种高强度的共同情绪状态	Pizarro et al., 2022; Rimé & Páez, 2023
认知	一种感知情绪同步	Páez et al., 2015; Włodarczyk et al., 2020
	注意趋同	Pizarro et al., 2022
社会整合和自我扩展	联系感与神圣感结合的心理体验	Gabriel et al., 2017, 2020

从认知角度来看,集体欢腾被视为感知情绪同步的过程。Páez 等人(2015)认为集体欢腾的形成是一个认知、情绪和行为多方面社会同步的过程。这种社会同步包括群体的认知同步(比如对群体符号有相同的认知)、情绪同步(Emotional Synchrony)和运动同步(Movement Synchronization),其中感知情绪同步是集体欢腾的核心要素。研究者将集体欢腾操作化为个体在群体中情感体验的相互夹带、协调和同步的共同感知,并编制了感知情绪同步量表(Páez et al., 2015; Włodarczyk et al., 2020)。当个体感知到与他人的情绪同步时,这种体验不仅显著增强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还提高了集体效能感(Páez et al., 2015)和社会联结(Cheong et al., 2023)。

从社会整合和自我扩展的视角,集体欢腾体现为联系感与神圣感结合的心理体验。当人们在集体活动中体验到一种与群体中他人联系的感觉和一种比自我更大的东西接触的感觉时,就会体验到集体欢腾(涂尔干, 2011, p.300, 582-583)。Gabriel 等人(2020)认为集体欢腾可以理解为一个体体验到的联系感和神圣感,并基于此编制了集体欢腾量表。而集体欢腾的过程也往往被视为一种心理转变,个体从平常状态进入一种神圣的超凡体验,即自我超越的体验(Rimé & Páez, 2023)。这种体验不仅与归属感紧密相关,还反映了个体与更大社会集体的联结感(Haidt et al., 2008; Hochschild, 2016)。

1.2 集体欢腾与集体情绪、kama muta 和心流的区分

集体欢腾并不完全等同于集体情绪。von Scheve (2011, 2013)提出,集体情绪是两个及以上个体,针对特定事件或对象产生的情绪反应趋同,强调其作为共同心理状态的属性。Goldenberg 等人(2020)侧重其动态性,认为这是多个个体对相同情境作出反应时形成的宏观情绪动态模式。而 Thonhauser (2022)基于集体分析框架提出,集体情绪是集体动态自组织系统的产物,强调集体情绪并非个体相似情绪的简单叠加,而是群体成员协同经历的情绪状态。Chung 等人(2023)认为集体情绪是群体内个体间通过共同影响与相互作用形成的人际情绪模式,具有情绪一致性、团结感和共同意识三大核心特征。从上述这些集体情绪的内涵可见,集体欢腾的确是基于集体情绪发生的,

但其并非集体欢腾所涉及情绪的全部。集体欢腾中的集体情绪虽然也是群体成员的共同情绪状态,但强度更高,且这种高强度情绪存在持续增强效应(Rimé & Páez, 2023)以及联结感和神圣感(Gabriel et al., 2020)。

以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广场舞为例,即便是旁观者、路人参与进舞蹈之中,也能够感受到群体共有的积极情绪,在音乐和舞蹈节奏达到高潮时,这种情绪也可能得到放大增强,但这种情绪并非集体欢腾。因为能够产生集体欢腾的广场舞,具有仪式的特征。参与者有准入条件,知道谁参加而谁被排出在外,活动有固定时间、地点、人员、站位安排等,舞蹈的表现是集体的成就,塑造了广场舞参与者的“神圣世界”,如果“神圣世界”被冒犯,与这个场景融为一体的舞者们会将冒犯行为视为对个人的冒犯,从而产生反抗甚至报复行为(李钧鹏, 许帅航, 2023)。

Pizarro 等人(2022)发现 kama muta 与集体欢腾关系密切。kama muta 源于梵语,意为被爱感动(“moved by love”),指的是当共同分享关系(Communal Sharing Relationships, CSRs)突然增强时产生的情绪体验(Fiske et al., 2019)。这种增强形式包括强化现有关系、建立新关系或回忆关系,例如,爱情表白、养宠物、个体或集体怀旧等(Fiske et al., 2025)。Fiske 等人(2025)认为,不管个体是否有意识,通过观察、回忆、思考和想象等途径体验到共同分享关系的骤然强化,都是 kama muta 产生的必要前提。Kama muta 作为一种独特的共同情绪,通常蕴含积极影响,促使个体主动寻求此类情感体验。这种情绪体验表现为伴随泪眼朦胧、身体寒颤等生理反应,并且能够激发人们加强、修复、维持关系的动机与道德承诺。它常于日常生活的偶然情境中,通过向他人展现善意、提供社会支持(如善待陌生人)等行为触发,也能在各类文化实践和仪式(如婚礼、颁奖典礼)里被唤起(Fiske et al., 2019, 2020)。相比之下,Rimé 和 Páez (2023)认为集体欢腾的情绪内涵更为广泛,包括了 kama muta。但值得注意的是,kama muta 中的共同分享关系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神灵、动物、宇宙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之间的关系(Fiske et al., 2025)。由此可知,集体欢腾涉及的关系仅为 kama muta 中共同分享关系的一部分。因此,集体欢腾与 kama muta 二者虽

然有交叉范畴,但却不能相互替代。

集体欢腾与心流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联系(Páez et al., 2015),特别是群体心流。群体心流是指成员在执行相互依赖的任务过程中产生共同的心流体验(van den Hout et al., 2018),是团队处于巅峰状态时的体验(Saweyer, 2006)。其中,互动同步性在群体心流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Hackert et al., 2022)。具体而言,群体心流不仅依赖于成员间的行为同步与协调(Gloor et al., 2013),还需要成员对群体资源和效能达成共同感知(Pels et al., 2018)。与集体欢腾不同,群体心流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最佳体验(Csikszentmihályi, 1990; Rimé & Páez, 2023),其核心在于通过协作提升整体效率,而非情感共鸣。因此,群体心流多发生于团队运动、艺术创作等协作任务中。

表2总结了集体欢腾与上述三个相关概念的区别。

2 集体欢腾的发生过程及其要素

涂尔干(2011)的研究发现,土著部落的生活呈现出“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交替的周期性模式,即日常生活和集体生活的交替。“有时候人们分成彼此独立的一个个小组,分散到各自的领地;每个家庭自食其力,或打猎或捕鱼,总之,就是尽其所能地争取必不可少的食物。有时候则相反,人们集中在特定地点进行集会,时间长达几天乃至几个月之久。”(p. 296)。集体欢腾往往出现在

集体活动的过程中,并将这两种生活模式区分开来。个体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借助共同的行为表达共同的情绪,不断互动产生集体欢腾,实现从世俗世界向神圣世界的转变。然而,涂尔干并未具体阐述集体欢腾的生成过程及其要素。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构建集体欢腾要素模型以揭示其产生的心理要素和条件。此外,亦有研究借鉴社会认同理论,以阐释集体欢腾所关联的认知要素;援引具身认知理论,以分析其间的具身模仿与行为同步现象;并参照情绪理论,以系统阐述集体欢腾中的情绪动态变化过程。

2.1 集体欢腾的产生要素和条件

Pizarro 等人(2022)认为,涂尔干集体欢腾理论的观点是,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个体的共在与互动会引发认知上的变化,个体意识逐渐被群体意识所取代,之后成员的行为趋于一致,从而产生集体情绪。这种情绪在互动中不断增强和共融,最终产生集体欢腾。

在涂尔干的理论框架下,Páez 等人(2015)构建了集体欢腾六要素模型,该模型认为集体欢腾的发生需要激活6个要素:聚集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同的关注点或目标,并随事件发展相互强化;对群体符号产生一致的反应;将注意力集中于目标;通过群体模仿或协调实现行为的同步;同步行为会促使情感表达的相互协调,使每个参与者的状态与群体状态相一致。6个要素共同发挥作用,促使参与者体验并表达出相似的情绪状

表2 集体欢腾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概念	情绪内涵	发生条件	常见情境	代表性研究
集体欢腾	一种共同情绪状态,涉及基本情绪和复杂情绪,体验到一种神圣感和联系感。	共同集中注意力、同步行为、情绪相互感染与放大	宗教、世俗仪式和日常生活场景	Rimé & Páez, 2023; Pizarro et al., 2022; Gabriel et al., 2017, 2020
集体情绪	一种宏观人际情绪动态模式,核心特征为情绪一致性、群体团结感与共同意识。	社会认同、共同注意、情绪模仿、情绪调节、人际夹带	集体活动	von Scheve, 2011; Goldenberg et al., 2020; Thonhauser, 2022; Chung et al., 2023
kama muta	一种特定的共同情绪,伴随着积极情绪体验。	通过观察、回忆、思考、想象等途径体验到CSRs的骤然强化等	日常生活情境、各种文化实践和仪式中(如帮助他人、观看感人电影、与动物互动、婚礼等)	Fiske et al., 2019, 2025
群体心流	本质为群体最佳体验,情感非关键。	互动同步、共同目标、高技能整合等	团队运动、艺术创作、工作协作等任务情境	Csikszentmihályi, 1990; Hackert et al., 2022; Saweyer, 2006; van den Hout et al., 2018

态,进而产生集体欢腾。已有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模型假设(Zabala et al., 2023)。之后,Włodarczyk等人(2020)进一步将模型要素概括为三个条件:人们聚集在一起并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将注意力集中于共同的符号,以及有意协调行为或行为同步。

此外,Rimé和Páez(2023)通过引入阶段性分析框架,在实证研究证据支持下,将集体欢腾的产生归纳为共同心态(由象征符号引导)、同质性表现、群体意识、情绪传递和相互放大,直至达到一种被称为“欢腾”的高强度状态。这是参与者在群体中情绪体验强度不断上升的演变过程。该理论通过拓展集体欢腾的过程性维度,凸显情绪体验强度的渐进式特征,是对集体欢腾产生过程更为细致的动态阐释。

2.2 集体欢腾产生过程中认知与关系双重转变

有学者用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集体欢腾现象的发生。社会认同指个体觉察到自己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和价值意义(Tajfel & Turner, 1979)。之后,Turner(1985)提出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SCT)扩展了社会认同理论,他认为人们在融入一个和自身存在共同特征或目标的群体时,便已经产生了自我分类,并将群体特征内化为自身特质,逐渐完成从个体意识到群体认同的转变。这种认同的转变是群体行为的基础。基于此,Hopkins等人(2016)认为,集体欢腾的产生涉及认知与关系的双重转变。在认知层面,群体成员共享的知识、经验及价值观等会形成共同参照系。当面对某个事件时,人们会依据这个共同参照系来理解和解释事件的意义。在关系层面,共同身份让个体意识到其他群体成员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体验到彼此间的亲密感,从而提升其积极体验和亲社会行为(Wakefield et al., 2011; Hopkins et al., 2016)。在此过程中,群体成员可能还会推动行为协调及群体价值观与规范的建构。

随着个人主义增长和计算机介导交流普及,世俗社会中集体欢腾的产生形式发生了变化。McCaffree和Shults(2022)的分配性欢腾理论认为,集体欢腾的产生不再是通过传统的形式,而是通过个体与多样化他人在多样化环境中的短暂、间歇性的互动来实现。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灵活和多样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交环境和互动伙伴。他们认为,个体间异质

性的增加和社会环境新颖性的提升有助于产生集体欢腾,进而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分配性欢腾理论并不强调个体间的关系,而是关注当下数智化时代短暂多样、灵活变化的社交身份中集体欢腾的产生。需要提出的是,现有研究表明,群体活动中共同的从属关系不是集体欢腾产生的必要条件(Kearney, 2018),但当个体间存在关系时,集体欢腾会更强烈(Xygalatas et al., 2011)。

2.3 集体欢腾产生过程中的具身模仿和同步动作

Gallese(2005)的具身模仿理论认为,多种镜像神经元匹配系统会协调个体有关自我与他人身体的经验性知识,并在面对他人意图行为时产生共鸣状态。在社会情境中,身体(如面部或肢体动作)可以作为情境线索对个体的情绪感知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黎晓丹等, 2018; 伍秋萍等, 2011)。因此,集体欢腾中个体间的趋同性可能受到了具身模仿的影响。例如,渡火仪式中的集体欢腾时刻,观众与渡火者的心率动态具有趋同性(Xygalatas et al., 2011)。也就是说,集体欢腾可能是观众通过具身模仿与渡火者表现出共享的唤醒模式。在欧洲某些地区的传统民间游行中,成百上千的居民会身穿传统军装,一起合唱传统歌曲、集体击鼓游行,这些庆祝活动带来了集体欢腾的体验(Páez et al., 2015)。实验研究表明,当参与者执行节奏性运动任务并观察另一个参与者动作时,其动作会自发地与被观察者产生同步,并且这种同步现象会受到环境因素的调节(Richardson et al., 2005)。因此,在社交情境中人们的动作行为可能会在有意无意中变得协调同步。Kearney(2018)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共同行动是集体欢腾的前提。相关研究也表明,共同集中注意力和行为同步是集体欢腾的关键因素(Włodarczyk et al., 2020),同步动作能够显著促进集体欢腾的产生(薛秋, 尹可丽, 2024; Zabala et al., 2024; Zlobina & Dávila, 2022)。此外,Saraei等人(2024)运用可穿戴设备监测技术发现,集体仪式中的参与者在身体运动与生理指标层面存在同步特征,既与仪式主导者保持动态一致,又与邻近个体形成互动关联。

2.4 集体欢腾生成进程中的情绪变化

涂尔干的经典理论和集体欢腾的心理学模型均强调,集体欢腾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情绪状态,其核心在于情绪的传递与共鸣放大。与个体多次

受到类似刺激时情绪能很快趋于平静不同,集体情绪具有情绪趋同、情绪体验强度增强与情绪级联等群体层面的特征(Goldenberg et al., 2020)。具体而言,在集体情境中,个体间情绪互动形成共鸣,使得情绪强度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并产生涟漪般扩散效应。实验研究发现,在面对面互动时,集体情绪会从高强度成员向低强度成员传递促使情绪趋同,并通过不断循环积累增强情绪强度(Zheng et al., 2020)。由此可知,个体间情绪的动态变化对于集体欢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个体情绪以静态叠加形式存在而缺乏互动中的传递与放大效应,那么将难以突破个体层面的情绪边界形成集体欢腾状态。

当前一些研究者对集体欢腾生成进程中的情绪感染、情绪趋同及情绪不断放大的内在机制展开了分析。情绪评价理论认为,情绪源于行动者对情境、行为或事件的“解释”,这些解释与行动者密切相关(Barrett, 2006)。von Scheve (2011)提出,情绪激发的认知基础在于评价内容与动机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当评价内容及动机趋于一致,并且评价结果表现出趋同性时,个体之间会产生相似甚至相同的情绪,有助于集体欢腾的形成。而情绪感染理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模仿或重复他人的表情、肢体动作和其他非语言表征,通过这样的方式,最终实现自身情绪状态与他人趋同(Barsade, 2002)。Xygalatas 等人(2024)通过准实验设计研究发现,集体仪式中会发生情绪感染,并且这种感染可能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自动模仿、共享注意力或对情境信息的认知处理。尽管以上理论使我们增加了对情绪趋同与传递的理解,但仍然无法解释社会情境中个体的情绪是如何被放大的。

汪祚军等人(2017)的评估-证实-放大模型表明,情绪评估存在两类情形:个体情绪被他人证实则放大,反之则不放大;而情绪证实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个体与他人情绪状态一致、情绪指向相同目标以及具备一定的认知动机。该模型进一步阐明了群体共享情绪的放大效应,解释了集体欢腾过程中情绪互动和放大的过程。然而,在集体欢腾的现实情境中,情绪一旦被激发放大后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此过程中,情绪感染可能通过多向互动网络传播,导致个体情绪强度表现出螺旋上升倾向(Shao et al., 2021)。在此背景下,刘

春晓等人(2022)提出,在集体仪式中,个体可以通过自我定型和自我锚定两种途径产生群体认同,基于此所形成的共享身份会驱动个体自我向关系自我或社会自我转变,使个体在心理上更倾向于接纳群体特质,增强情绪模仿效应,扩大情绪的传播范围和持续效果。

2.5 集体欢腾的理论要素结构框架

上述梳理呈现了当前心理学对集体欢腾的多种理论视角。集体欢腾六要素模型与阶段性分析框架以动态交互发展为脉络,系统构建了认知触发、行为同质化和情绪感染、趋同和放大的心理机制,提供了理解集体欢腾发生过程的整体性框架。社会认同理论阐释了集体欢腾过程中成员身份、共同目标、群体意识的认知构建过程。具身模仿理论则解释了个体间行为同质化的机制。情绪评价理论、情绪感染理论及评估-证实-放大模型等深入阐释集体欢腾产生时情绪动态变化的过程。基于上述理论涉及到的认知、行为和情绪三个维度,本研究总结的集体欢腾生成机制的要素框架见图1。

值得关注的是,集体欢腾事件普遍呈现周期性特征,但当前的理论框架仅阐释了单次集体欢腾的生成过程,且主要聚焦于自下而上的形成机制。周期性集体欢腾中的路径依赖效应(源于前序经历)与单次欢腾的生成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对此差异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尚待深入。此外,现有理论研究聚焦于线下真实情境,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已催生出大规模线上互动场景。这种具身共在性的消解(即面对面互动的物理空间缺失)以及数字化中介互动的增强,是否会影响集体欢腾产生的关键要素?其形成机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路径?这些问题都待探讨。

3 集体欢腾的情境特征及影响因素

3.1 情境特征

首先,集体欢腾通常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例如节日庆典时的特定时间(如春节的农历新年期间)和空间(如举办庆祝活动的广场、街道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场馆和赛事时间(Kidder, 2006)、音乐节的活动场地和时间(Levang et al., 2017)。从时间看,集体欢腾既可以是周期性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周期性的集体欢腾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每到固定的时间就会重复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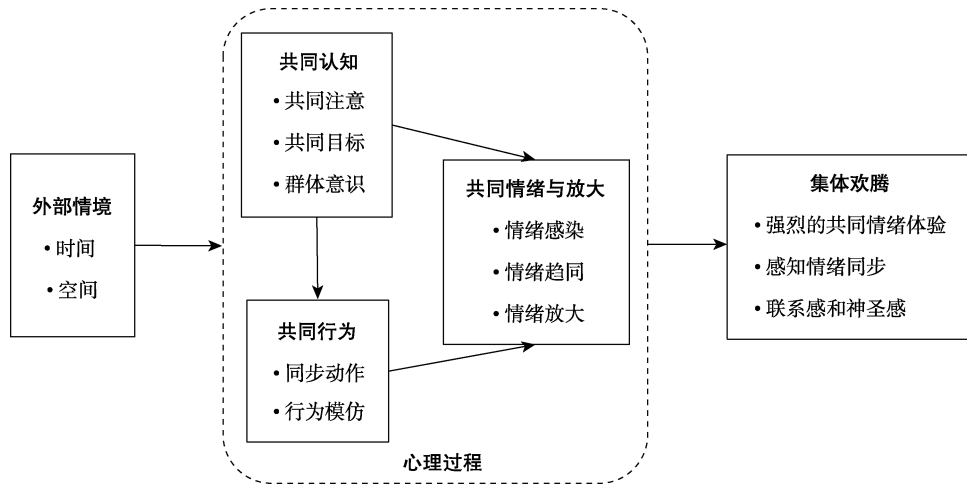


图 1 集体欢腾的生成机制要素框架图

活动，以集体仪式、节日庆典为典型代表。比如，印度北部的印度教节日“圣浴节” (Magh Mela) 是一年一度的大型朝圣活动，活动期间会吸引数百万的朝圣者前往恒河。其中，有一类特殊人群——kalpwasis，通过共同践行严苛的苦行仪式追求“ananda” (崇高的极乐) 的朝圣体验，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集体欢腾的体现 (Hopkins et al., 2016)。而临时性的集体欢腾通常具有突发或临时的背景和目的，以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最为突出，如 2017 年的伦敦科学大游行 (Stephens et al., 2022)。

从空间来看，集体欢腾不仅可以发生在线下真实情境中，而且在数字化浪潮下，集体欢腾已延伸至虚拟空间。线上情境中，人们通过网络留言、直播弹幕的实时互动营造集体参与氛围。Naidu 等人 (2022) 提出，集体欢腾即使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能发生，从而成为一种使个体在隔离中仍能感受到与社会联结的潜在机制。即使参与的个体在物理空间上彼此分离，集体情绪的共享也会推动相关群体的社会同步，从而激发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欢腾 (Garcia & Rimé, 2019; Stephens et al., 2022)。Garcia 和 Rimé (2019) 通过分析巴黎恐怖袭击后 62114 名 Twitter 用户的数字痕迹，对集体欢腾理论进行了线上验证。Gabriel 等人 (2020) 也发现个体能够与不在场的他人产生联系感。Mitchell 等人 (2022) 实验研究表明，线上共同关注他人身体或社会痛苦可以通过集体欢腾间接促进凝聚力和人际亲密度。此外，COVID-19 大流行期间社区中的集体欢腾现象通过网络跨越

了 25 个国家 (Fattore et al., 2023)。

3.2 群体因素

集体欢腾通常伴随着群体符号的呈现。Rimé 和 Páez (2023) 认为，群体情境中的旗帜、标志、口号或特定服装等群体符号，能够引导人们形成共享身份与群体认同。Zumeta 等人 (2020) 也表示，示威活动中的特定行为或手势 (如举起双手做出三角形的手势) 以及特定符号 (如紫色标识符号)，共同体现并强化了群体价值观与认同感。集体欢腾的强度还会受到群体规模和密度的影响。集体欢腾通常出现在大型的或激烈的集体活动中，其规模可能是数百人，甚至数百万人 (Kearney, 2018; Stephens et al., 2022)，然而也有可能出现在日常生活小规模群体活动中，如 6~19 人的家庭销售聚会 (Hyde, 2018)。实验研究表明，相比小团队规模，大团队规模中的集体欢腾更高 (薛秋, 尹可丽, 2024)。在大型音乐会中发现，人群密度的增加与集体欢腾更强烈的情绪反应有关 (Liebst, 2019)。

3.3 个体因素

除前文所述的影响因素外，个体因素也会对集体欢腾产生影响，如个体的集体欢腾经历与人格特质。研究表明，参加宗教仪式频率越高，集体欢腾体验越强 (Draper, 2014)。这种体验不仅与近期集体欢腾经历有关，具有累积效应，而且集体欢腾倾向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受经历频率的影响 (Gabriel et al., 2017)。此外，集体欢腾与宜人性、外向性、开放性和尽责性呈正相关，而与神经质无关 (Gabriel et al., 2020; Pizarro et al., 2021)。在

特殊的活动背景下,集体欢腾还可能与性别和年龄有关。例如,妇女节抗议活动中,年轻人和女性的集体欢腾更高(Zumeta et al., 2020)。

4 集体欢腾的积极心理效应

无论是集体仪式还是世俗生活中,集体欢腾的产生都会带来积极影响(Wlodarczyk et al., 2021)。集体欢腾在个体心理层面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积极情绪体验、满足归属感需求以及促进心理健康。集体欢腾在群体心理层面同样具有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促进群体认同、增强群体凝聚力,以及构建与强化群体规范。

4.1 集体欢腾的个体心理效应

在集体欢腾状态下,个体不仅可以在群体中获得积极情绪体验,还能在离开群体后持续感受到积极的情感增益,包括增强力量、自信以及对他人的开放态度(Garcia & Rimé, 2019)。尽管共享、趋同和协调的情绪状态可能包含消极或矛盾的成分,但情绪同步性通常会放大情绪的程度,进而激发“聚在一起的快乐”(Zumeta et al., 2020)。当个体参与集体活动并体验集体欢腾时,他们的内心往往能够获得平静,感受到超然感与幸福感。与日常生活不同,集体欢腾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体的深层满足和喜悦感。在集体活动中,参与者相互支持,而集中的互动进一步促进了积极的集体情绪(Heider & Warner, 2010)。Haidt 等人(2008)提出的“蜂巢假说”认为,人类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偶尔“迷失自我”,这种过程能够让个体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联系感。研究发现,成功的集体聚会通常能够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情绪、自尊心和效能感(Páez et al., 2015)。此外,集体欢腾还能够引发积极的自我超越情绪体验(Wlodarczyk et al., 2020; Pizarro et al., 2022)。

集体欢腾能够满足归属感需求。研究表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心理机制,促使其积极寻求社会互动以避免孤立(Baumeister & Leary, 1995; Stevens & Fiske, 1995)。归属感的满足不仅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入,还能增强幸福感。当个体在群体中感受到与他人的连接时,往往会产生更好的体验(Frijda, 1988)。Gabriel 等人(2017, 2020)研究发现,集体欢腾不仅能够满足关系需求,还可以显著降低孤独感,同时增强归属感。就像 Harlow (1958)经典实验发现,幼猴能够

从布料替代品中获得心理安慰。同样,人类也能够通过社会替代物或象征性社会联系来满足归属感(Gabriel et al., 2016)。尽管这些象征性联系提供了间接的归属感满足,但其效能与集体欢腾的直接社会互动相比可能存在局限。然而,虚拟社交世界的兴起使个体能够在现实社交不足时部分延续集体欢腾的体验,通过线上互动的方式来满足个体的归属感。

集体欢腾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根据涂尔干(2011)的观点,集体欢腾能够赋予人们应对日常挑战的勇气,提升适应能力,从而促进幸福感与个人发展。当前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研究发现,集体欢腾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Páez et al., 2015),并能增强个体对生活的意义感(Gabriel et al., 2017)。Wlodarczyk 等人(2020)研究也表明,集体欢腾能够预测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和心理幸福感。个体积极参与集体活动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倾向,而且对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深远影响(Ainsworth, 1989; Baumeister & Leary, 1995)。在集体活动中,共享的认知与情感体验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个体幸福感,还可增强个体的希望感(Rimé et al., 2010)。在诸如朝圣等大规模群体活动中,与大群体的互动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幸福感,同时缓解了不健康症状(Tewari et al., 2012)。此外,对集体欢腾事件的怀旧也能够重新点燃这种情感体验,从而长期或阶段性地促进心理健康(Naidu et al., 2023)。

值得注意的是,集体欢腾并非仅局限于罕见的强烈情境或严肃目的的仪式中。涂尔干(2011)认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个体与事件或目的的关联较弱时,依然可能产生普遍意义上的集体欢腾。研究表明,观看体育赛事能够引发集体欢腾,进而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张晓丽, 2025)。Gabriel 等人(2020)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小型活动,如观看电影、参与课堂讨论,甚至在个人兴趣不大的活动中,个体也会体验到微弱的集体欢腾。这种微弱的体验虽然不如大型活动强烈,但同样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有助于健康和快乐的生活。

上述对集体欢腾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不同情境下的心理效应:一方面,强烈的群体活动通过情感联结与深层次的社会互动显著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日常小型活动则通过累积效应,

逐步增强个体的心理健康。这一双重效应框架不仅有助于理解集体事件如何促进心理健康,也为探索日常社交活动的心理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4.2 集体欢腾的群体心理效应

集体欢腾能够促进群体认同。根据社会认同理论,集体欢腾产生时,群体意识取代个体意识,表现出自我关注的减少,社会取向的增强,以及自我与他人的重叠等特点。Rimé 和 Páez (2023) 强调,集体欢腾的产生能够使个体摆脱日常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转而融入更广泛的社会联系。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集体欢腾不仅与更强的群体认同相关,还能提升个体的经验开放性(Bouchat et al., 2019)。参与集体情感活动不仅强化了对其他参与者的认同感,也进一步巩固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同(Khan et al., 2016)和身份融合(Zumeta et al., 2020)。此外,研究发现,集体欢腾文化实践能够促进社区的共同体意识(姚畅, 龚浩群, 2021)。

集体欢腾能够增强群体凝聚力。研究表明,集体仪式能显著增强参与者的身份融合(Lobato & Sainz, 2019; Zabala et al., 2024)。Włodarczyk 等人(2021)通过两项准实验和纵向研究证明集体欢腾能够显著增强社会凝聚力、集体自尊和积极的共同信念。其中,积极情绪在集体欢腾与人际凝聚力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而自我超越则在集体欢腾与社会凝聚力及超越信念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Zabala 等人(2023)基于半纵向与准实验的研究结果显示,参与集体欢腾活动能够有效提升社会凝聚力,重建社会信任,并增强个人及集体效能感。Fiske (1992)的联合社会性模式指出,群体成员通过共同参与仪式和庆典,体验到强烈的社会联结和共同体感。这种强烈的社会纽带感与共享性不仅是集体欢腾提升群体凝聚力的核心,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痛苦与创伤性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Włodarczyk et al., 2016, 2017; Zlobina & Dávila, 2022)。

集体欢腾能够构建并强化群体规范。研究表明,情绪同步是感知社会规范的重要预测因素,参与仪式通过情绪同步间接影响规范感知(Zlobina & Dávila, 2022)。涂尔干(2011)指出,通过节奏化、秩序化的集体行动(如有节奏的手势和呼喊),人们能够实现情绪同步及群体和谐,从而

协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和信仰,促成群体规范的形成。研究发现,集体仪式不仅可以通过集体欢腾提升自我效能感,还可以激励群体成员对共同价值观、群体领导者和社会规范的道德承诺(Rai & Fiske, 2011; Páez et al., 2015; Pizarro et al., 2022)。Castro-Abril 等人(2021)对抗议活动的研究表明,社会运动中产生的集体欢腾能够激发个体的认知创造力,推动群体价值观念的动态重构。

尽管集体欢腾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但当其具体体现为群体团结的符号或神圣物时,能够产生更为长久的影响(Collins, 2004)。而这种神圣感或接触群体价值观的体验,往往是集体仪式成功的潜在结果(Włodarczyk et al., 2020)。在集体活动中,参与者通过践行与其社会身份相符的价值观与规范,获得积极的情感反馈,从而进一步增强对群体的归属感和价值认同。

5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领域对集体欢腾这一普遍且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本文从发生过程及其心理要素、情境特征、积极心理效应等方面具体展示了集体欢腾的传统和现代意义。然而,关于集体欢腾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有较多问题待解决。

5.1 结合现实探讨不同情境中的集体欢腾现象

首先,需要对日常集体活动中的集体欢腾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涂尔干在对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中,虽着重探讨具有神圣性与严肃目的的集体仪式,但已暗含日常集体活动孕育集体欢腾的理论空间。他认为,世俗化的集体欢腾可脱离宗教属性,演变为大众均可参与的公共狂欢。“纪念仪式渐渐变成了普通意义上的集体欢腾,它仅仅是一种公共的欢闹,不再具有任何宗教性质,所有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参加。”(涂尔干, 2011, p.523)。当前的一些研究证明了涂尔干对公共狂欢的论断,集体欢腾发生在世俗生活的各种集体情境中,如婚礼(Goffman, 2019)、观看体育比赛(吴国栋, 殷怀刚, 2021)、肇兴侗寨的节庆旅游剧场(余志远 等, 2023)、音乐会(Vandenberg et al., 2021; Koefler et al., 2026)和欣赏戏剧表演(Simonot-Bérenger et al., 2025)等。

当下人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心理

学对集体欢腾的研究重点应该是日常集体活动。那么, 研究需要警惕随意拓展集体欢腾的内涵与外延, 也要避免仅用单个要素表征集体欢腾的现象。正如本文开头首段万人参与的演唱会中所产生的集体欢腾现象, 是一个相对短暂的集体情绪的不断增强与高涨, 其中所产生的联结感与神圣感, 随着演唱会结束而消弥。如何理解这类即时性而非周期性集体活动中的欢腾, 涂尔干并没有给出答案。基于前述的已有理论和研究, 本文认为对日常集体活动中集体欢腾的研究可以在图 2 所概述的要素框架中进行考虑和设计。

其次, 需要考察线上集体欢腾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如前文所述, 集体欢腾的发生超越了“身体共在”的条件, 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在跨时空的线上集体欢腾中, 行为同步因缺乏身体接触而被弱化, 情绪同步则需要借助语言交流、视觉符号以及群体共享的文化记忆等方式实现。然而, 当前研究对其发生机制认识较少, 线上和线下的机制差异尚不清晰。正如前文中强调, 主观情绪体验及其外在表达会不断产生放大效应是集体欢腾心理过程的核心机制(Rimé & Páez, 2023)。而集体情绪能够通过线上互动产生和调节, 情绪表达对于虚拟社区的持续性与活力起着关键作用(Chmiel et al., 2011)。因此, 情绪表达与情绪感知方式可能是线上与线下集体欢腾产生机制差异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 线上情境中的情绪表达依赖文字信息和表情符号, 情绪感知则更依赖个体对文本

的主观解读与评价, 这种互动的间接性与延迟性可能削弱了情绪同步的深度与强度。研究表明, 与虚拟情感事件相比, 在现实事件中, 成员之间的生理唤醒程度更高, 更一致(White et al., 2024)。由此可知, 线上集体欢腾在情感深度和长期心理效应上可能无法完全替代真实的人际互动。然而, 线上情境突破了时空限制, 具备更长的情绪持续性性与扩散性, 这为集体欢腾效应的广泛传播与缓解个体孤独感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 对于线上集体欢腾的发生机制的阐释, 有助于把握群体心理变化的特点, 深刻理解当下的群体现象(如弹幕狂欢和网络暴力)。因此, 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考察线上集体欢腾的产生机制及其效应与线下集体欢腾的区别。

5.2 揭示周期性集体欢腾中自上而下的心理机制

在集体欢腾中, 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心理机制(刘春晓 等, 2022)。然而, 当前理论与实证研究多聚焦于集体欢腾中自下而上的过程, 相较而言对自上而下的趋同路径关注不足。Rimé 和 Páez (2023)提出, 集体欢腾可能通过更复杂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诱导情绪趋同(如言语或象征符号)。有研究者认为, 文化习俗有助于集体情绪的大规模传播和验证预期的情感(von Scheve & Ismer, 2013)。特别是周期性集体欢腾事件, 如在传统节日庆典中, 与集体情绪体验相关的情感记忆与既定的群体规范在筹备阶段便引导参与者调适情绪, 从而呈现自上而下的趋同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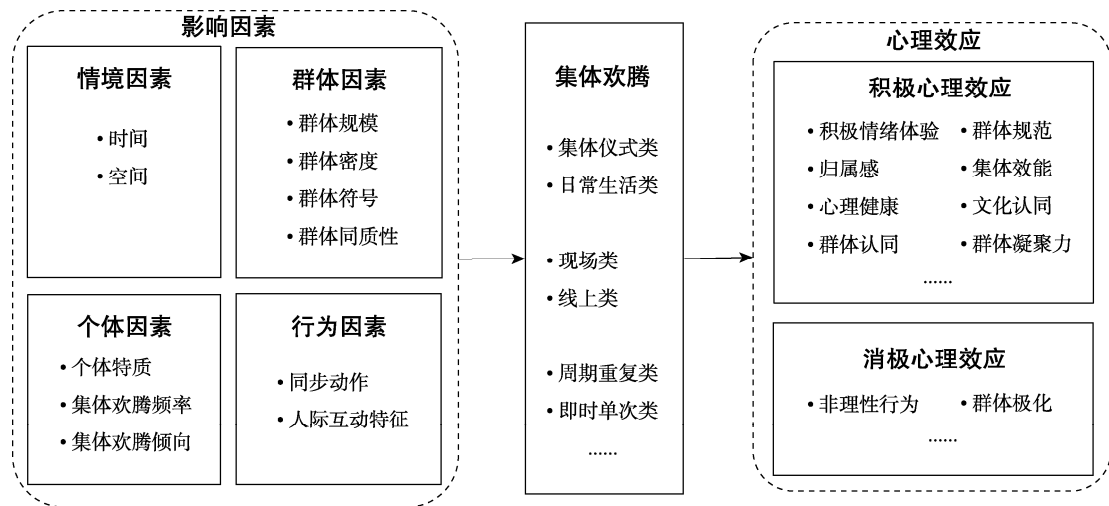


图 2 日常集体活动中集体欢腾的心理模型

态。此外,怀旧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可以通过集体记忆唤起对共同经历的心理回溯,强化情感体验,从而使个体再一次感受到集体欢腾(Evans et al., 2021; Naidu et al., 2023)。尽管已有部分研究留意到上述现象,但关于集体欢腾中自上而下心理机制尚不清楚,未来仍需进一步探讨。

5.3 拓展集体欢腾的多维心理效应

当前实证研究关注到了集体欢腾的积极方面,但对集体欢腾其他心理效应探讨较少,如消极影响。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关注集体欢腾的消极影响。涂尔干(2011, p.296-301)提醒我们集体欢腾具有双重效应:它既可能带来积极体验,也可能导致自我约束的丧失,引发非理性行为。正如Festinger等人(1952)认为,群体环境可能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丧失,诱发反社会行为。Zimbardo(1969)进一步强调,群体所带来的匿名感、社会约束的缺失以及感官超载,会促使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的出现。在相关实证研究中,集体情绪同样呈现出双重效应。例如,集体暴力受害者参与哀悼仪式时,不公正感和哀伤感可能加剧,但社会支持与助人意愿得以提升(Beristain et al., 2000)。基于此,未来研究在深入探究集体欢腾积极效应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剖析潜在消极影响及其触发条件,这对于把握群体行为规律、有效预防负面群体现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此外,集体欢腾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承载着关键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功能,然而当前针对集体欢腾的文化心理效应的探究尚显不足。集体欢腾活动往往伴随特定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此类元素在群体互动进程中得以持续强化,进而加深群体成员对集体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Zumeta et al., 2020)。以春节为例,红色春联承载新年祝愿,鞭炮寓意驱邪迎新,年夜饭桌上,象征年年有余的鱼、寓意团圆的汤圆等,皆饱含深厚文化底蕴。在阖家团聚之际,家庭成员们围坐推杯换盏、笑语晏晏间,产生了群体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家族文化的代际传承。此外,伴随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浪潮,集体欢腾可能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关键媒介(如奥运会、世界杯)。尽管集体欢腾可能在文化传承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集体欢腾究竟触发何种文化心理效应、其产生路径如何,以及与集体欢腾促进心理健康的机制有何异同等,这些问题都

有待解决。

5.4 需要探索集体欢腾的应用路径

集体欢腾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效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提升个体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值得关注的是,集体欢腾的产生并不局限于积极、庆祝性的场景,在某些特殊环境中同样能够发挥情绪调节的作用。例如,参加纪念仪式或公共哀悼活动,能够通过共享焦虑、悲伤等强烈情感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Afyonoğlu & Güre, 2024; White et al., 2024)。Walby和Cole(2019)研究发现,通过组织集体活动,监狱中的囚犯能够在亲社会行为中体验集体欢腾,形成积极的情绪反馈,从而缓解心理压力,改善负面情绪。这表明,集体欢腾在封闭、压力较大的环境中,依然具有促进心理健康的潜力与应用价值。因此,未来研究可从集体欢腾视角出发,去探索更多群体的积极心理实践方向。

参考文献

- 爱弥尔·涂尔干. (2011).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 汲喆译). 商务印书馆.
- E·迪尔凯姆. (1995).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狄玉明译). 商务印书馆.
- 李钧鹏, 许帅航. (2023). 作为集体欢腾的广场舞. *江海学刊*, 1, 137-147+256.
- 黎晓丹, 叶浩生, 丁道群. (2018). 通过身体动作理解人与环境: 具身的社会认知. *心理学探新*, 38(1), 20-24.
- 刘春晓, 刘立志, 王丹, 陈文锋. (2022). 集体仪式促进群体情绪感染的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0(8), 1870-1882.
- 汪祚军, 侯怡如, 匡仪, 唐辉一, 赵珍珍, 陈虹霞. (2017). 群体共享情绪的放大效应. *心理科学进展*, 25(4), 662-671.
- 吴国栋, 殷怀刚. (2021). 训练、竞赛、观众: 疫情下竞技体育如何可能?——“没有赛事的训练”与“没有观众的赛场”工作坊综述. *体育与科学*, 42(3), 112-120.
- 伍秋萍, 冯聪, 陈斌斌. (2011). 具身框架下的社会认知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9(3), 336-345.
- 薛秋, 尹可丽. (2024). 同步动作对社会联结的影响: 集体欢腾的中介作用和团队规模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56(12), 1821.
- 姚畅, 龚浩群. (2021). 欢腾式发展: 泰北乡村农家乐项目的民族志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1), 69-82.
- 余志远, 闫铭, 谷平平. (2023). 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 节庆旅游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0(4), 82-88.
- 张晓丽. (2025). 集体的欢腾: 观赏体育赛事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生成机制与实证检验.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59(5), 19-26.

- Afyonoğlu, M. F., & Güre, M. D. P. (2024). Unveiling collective grief: A qualitative study of X posts reflecting on the Kahramanmaraş earthquake anniversary in Türkiye. *Death Studies*. <https://doi.org/10.1080/07481187.2024.2404927>
- Ainsworth, M. S. (1989). Attachments beyond infa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4), 709–716.
- Barrett, L. F. (2006). Are emotions natural kind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28–58.
- Barsade, S. G. (2002). The ripple effect: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group behavi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7(4), 644–675.
-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3), 497–529.
- Beristain, C. M., Paez, D., & González, J. L. (2000). Rituals, social sharing, silence, emo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y claims in the case of the guatemalan genocide. *Psicothema*, 12(Suppl), 117–130.
- Bouchat, P., Rimé, B., Eycken, R. V., & Nils, F. (2019). The virtues of collective gatherings: A study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 major scouting even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0(3), 189–201.
- Bravo, D., Oriol, X., Gómez, M., Cortez, D., & Unanue, W. (2020). The effects of the 2016 Copa América Centenario victory on social trust, self-transcendent aspirations and evaluate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with the national team and collective pride in major sport ev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591498.
- Bu, F., Steptoe, A., & Fancourt, D. (2020). Who is lonely in lockdown? Cross-cohort analyses of predictors of loneliness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ublic Health*, 186, 31–34.
- Castro-Abril, P., Da Costa, S., Navarro-Carrillo, G., Caicedo-Moreno, A., Gracia-Leiva, M., Bouchat, P., ... Paez, D. (2021). Social identity,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creativity,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2019 Chilean populist protes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64434.
- Cheong, J. H., Molani, Z., Sadhukha, S., & Chang, L. J. (2023). Synchronized affect in shared experiences strengthens social connection. *Communications Biology*, 6(1), 1099.
- Chmiel, A., Sienkiewicz, J., Thelwall, M., Paltoglou, G., Buckley, K., Kappas, A., & Hołyst, J. A. (2011). Collective emotions onlin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ommunity life. *PLOS ONE*, 6(7), e22207.
- Chung, V., Grèzes, J., & Pacherie, E. (2023). Collective emotion: A framework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Emotion Review*, 16(1), 28–45.
- 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sikszentmihá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 Draper, S. (2014). Effervescence and solidarity i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53(2), 229–248.
- Evans, N. D., Reyes, J., Wildschut, T., Sedikides, C., & Fetterman, A. K. (2021). Mental transportation mediates nostalgia's psychological benefits. *Cognition and Emotion*, 35(1), 84–95.
- Fattore, T., Drake, G., Falloon, J., Mason, J., & Mogensen, L. (2023). Disruption, slowness,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COVID-19 lockdow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Child Maltreatment: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6(3), 393–413.
- Festinger, L., Pepitone, A., & Newcomb, T. (1952). Some consequences of de-individuation in a group.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2), 382–389.
- Fiske, A. P. (1992).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ity: Framework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social rela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99(4), 689–723.
- Fiske, A. P. (2020). The lexical fallacy in emotion research: Mistaking vernacular words for psychological entiti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27(1), 95–113.
- Fiske, A. P., Schubert, T. W., & Seibt, B. (2025). Seeking communal emotions in social practices that culturally evolved to evoke emotions: Worship, kitten videos, memorials, narratives of love, and mor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6, 607–633.
- Fiske, A. P., Seibt, B., & Schubert, T. (2019). The sudden devotion emotion: Kama muta and the cultural practices whose function is to evoke it. *Emotion Review*, 11(1), 74–86.
- Frijda, N. H. (1988). The laws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5), 349–358.
- Gabriel, S., Naidu, E., Paravati, E., Morrison, C. D., & Gainey, K. (2020). Creating the sacred from the profa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5(1), 129–154.
- Gabriel, S., Valenti, J., Naragon-Gainey, K., & Young, A. F. (2017). The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assembl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Tendency for Effervescent Assembly Measure (TEAM).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9(11), 1349–1362.
- Gabriel, S., Valenti, J., & Young, A. F. (2016). Social surrogates, social motivations,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The case for a strong, subtle, and sneaky social self.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3, 189–243.
- Gallese, V. (2005). Embodied simulation: From neurons to phenomenal experience.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4(1), 23–48.
- Garcia, D., & Rimé, B. (2019). Collective emotions and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digital traces after a terrorist attack.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4), 617–628.
- Gloor, P. A., Oster, D., & Fischbach, K. (2013). JazzFlow—Analyzing “Group flow” among jazz musicians through

- “Honest Signals.”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27(1), 37–43.
- Goffman, A. (2019). Go to more parties? Social occasions as home to unexpected turning points in life trajectorie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82(1), 51–74.
- Goldenberg, A., Garcia, D., Halperin, E., & Gross, J. J. (2020). Collective emo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2), 154–160.
- Hackert, B., Lumma, A.-L., Raettig, T., Berger, B., & Weger, U. (2022).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low in social context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53(1), 100–125.
- Haidt, J., Seder, J. P., & Kesebir, S. (2008). Hive psychology, happiness, and public policy.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7, S133–S156.
- Harlow, H. F. (1958). The nature of lov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3(12), 673–685.
- Heider, A., & Warner, R. S. (2010). Bodies in sync: Interaction ritual theory applied to sacred harp singing. *Sociology of Religion*, 71(1), 76–97.
- Hochschild, A. R. (2016). The ecstatic edge of politics: Sociology and Donald Trump.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5, 683–689.
- Hopkins, N., Reicher, S. D., Khan, S. S., Tewari, S., Srinivasan, N., & Stevenson, C. (2016). Explaining effervescence: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d social identity and positive experience in crowds. *Cognition and Emotion*, 30(1), 20–32.
- Hyde, C. A. (2018). Charisma, collectives, and commitment: Hybrid authority in radical feminist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4), 424–436.
- Kearney, M. (2018). Totally alive: The Wisconsin uprising and the source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eory and Society*, 47(2), 233–254.
- Khan, S. S., Hopkins, N., Reicher, S., Tewari, S., Srinivasan, N., & Stevenson, C. (2016). How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impacts social ident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India. *Political Psychology*, 37(3), 309–325.
- Kidder, J. L. (2006). Bike messengers and the really real: Effervescence, reflexivity, and postmodern identity. *Symbolic Interaction*, 29(3), 349–371.
- Koefler, N., Naidu, E., Gabriel, S., Schneider, V., Pascuzzi, G. S., & Paravati, E. (2026). Let the music play: Live music foster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leads to lasting positive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52(3), 546–55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41288027>
- Krauss, A. (2018). Luisa’s ghosts: Haunted legality and collective expressions of pain. *Medical Anthropology*, 37(8), 688–702.
- Labaree, B. W. (1959). Review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 study of the symbolic life of Americans, by W. L. Warner.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32(4), 538–542.
- Lambert, M. (1993). Ancient Greek and Zulu sacrificial ritua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umen*, 40(3), 293.
- Levang, L. E., Bye, T. A., Hirrich, A., Rokkum, N. H. A., Torp, T. U., & Tjora, A. (2017). Musikkfestivalens kollektive effervesens. *Tidsskrift for Samfunnsforskning*, 58(1), 62–83.
- Liebst, L. S. (2019).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 multilevel study. *Sociological Science*, 6, 27–42.
- Lobato, R. M., & Sainz, M. (2019). On the way to fusion through the pilgrims’ route: Factors that maintain identity fusion in collective ritual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3(4), 502–518.
- McCaffree, K., & Shults, F. L. (2022). Distributive effervescence: Emotional energy and social cohesion in secularizing societies. *Theory and Society*, 51(2), 233–268.
- Mitchell, J., Occhipinti, S., & Oaten, M. (2022). The affiliative power of others’ pain onlin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3(4), 308–328.
- Naidu, E., Gabriel, S., Wildschut, T., & Sedikides, C. (2023). Reliving the good old days: Nostalgia increas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rough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5(1), 22–32.
- Naidu, E. S., Paravati, E., & Gabriel, S. (2022). Staying happy even when staying 6 ft apa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overs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0, 111549.
- Nowland, R., Necka, E. A., & Cacioppo, J. T. (2017). Loneliness and social internet use: Pathways to reconnection in a digital world?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1), 70–87.
- Páez, D., Rimé, B., Basabe, N., Włodarczyk, A., & Zumeta, L. (2015).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5), 711–729.
- Pels, F., Kleinert, J., & Mennigen, F. (2018). Group flow: A scoping review of definition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measures and findings. *PLoS ONE*, 13(12), e0210117.
- Pizarro, J. J., Alfaro-beracoechea, L., Cusi, O., Ibarra, M. L., Zumeta, L., & Basabe, N. (2021). Eventos locales, efectos globales: Emociones trascendentes e identificación con toda la humanidad. *Revista de Psicología*, 39(2), 625–654.
- Pizarro, J. J., Zumeta, L. N., Bouchat, P., Włodarczyk, A., Rime, B., Basabe, N., ... Paez, D. (2022). Emotional processes,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utcomes during collective gatherings and demonstra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974683.
- Plancke, C. (2014). Affect, creativity, and community-making in a Congolese song-dance performance: Or how to follow the movement of the social.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4), 653–669.
- Rai, T. S., & Fiske, A. P. (2011). Moral psychology is relationship regulation: Moral motives for unity, hierarchy,

- equality, and proporti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18(1), 57–75.
- Richardson, M. J., Marsh, K. L., & Schmidt, R. C. (2005). Effects of visual and verbal interaction on unintentional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1(1), 62–79.
- Rimé, B., & Páez, D. (2023). Why we gather: A new look, empirically documented, at Émile Durkheim's theory of collective assemblies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6), 1306–1330.
- Rimé, B., Páez, D., Basabe, N., & Martínez, F. (2010).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emotional climate: Follow-up of Spanish citizen's response to the collective trauma of March 11th terrorist attacks in Madri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6), 1029–1045.
- Saraei, M., Paxton, A., & Xygalatas, D. (2024). Aligned bodies, united hearts: Embodied emotional dynamics of an Islamic ritual.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9(1911), 20230162.
- Sawyer, R. K. (2006). Group creativity: Musical performance and collaboration. *Psychology of Music*, 34(2), 148–165.
- Serazio, M. (2013).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sports fandom: A Durkheimian exploration of team myths, kinship, and totemic rituals. *Communication & Sport*, 1(4), 303–325.
- Shao, Q., Wang, H., Zhu, P., & Dong, M. (2021). Group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simulation in large-scale flight delays based on the two-layer network model.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573, 125941.
- Simonot-Bérenger, O., Chung, V., Pelletier, J., & Grèzes, J. (2025).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mediates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emotion on spectators' enjoyment of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aca0000765>
- Stephens, N., Vrikki, P., Riesch, H., & Martin, O. (2022). Protesting populist knowledge practice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t the March for Science London. *Cultural Sociology*, 16(2), 212–230.
- Stevens, L. E., & Fiske, S. T. (1995).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in social life: A social survival perspective. *Social Cognition*, 13(3), 189–214.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Brooks/Cole.
- Tewari, S., Khan, S., Hopkins, N., Srinivasan, N., & Reicher, S. (2012). Participation in mass gatherings can benefit well-being: Longitudinal and control data from a north Indian Hindu pilgrimage event. *PLoS ONE*, 7(10), e47291.
- Thonhauser, G. (2022). Towards a taxonomy of collective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14(1), 31–42.
- Turner, J. C. (1985).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lf concept: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roup behavior.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 77–122.
- van den Hout, J. J. J., Davis, O. C., & Weggeman, M. C. D. P. (2018).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eam flow.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52(6), 388–423.
- Vandenberg, F., Berghman, M., & van Eijck, K. (2021). 'Wear clogs and just act normal': Defining collectivity in Dutch domestic music concerts. *Cultural Sociology*, 15(2), 233–251.
- von Scheve, C. (2011). Collective emotions in rituals: Elicitation, transmission, and a "Matthew-effect". In A. Michaels & C. Wulf (Eds.), *Emotions in rituals and performances* (pp. 55–77). Routledge.
- von Scheve, C., & Ismer, S. (2013). Towards a theory of collective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5(4), 406–413.
- Wakefield, J. R. H., Hopkins, N., Cockburn, C., Shek, K. M., Muirhead, A., Reicher, S., & Van Rijswijk, W. (2011). The impact of adopting ethnic or civic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belonging for others' treat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12), 1599–1610.
- Walby, K., & Cole, D. (2019). Beyond emotional labour: Emotions and peer support in a Canadian prison.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33, 100631.
- White, C., Morales, D., Xygalatas, D., Hernu, M., Mathiassen, A., Ainsworth, A., ... Whitehouse, H. (2024). How shared suffering bonded Britons witnessing the Queen's funeral. *Scientific Reports*, 14(1), 16620.
- Williams, M. (2020). U2's '360°' tour: An episodic and perpetual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Leisure Studies*, 39(6), 797–810.
- Wlodarczyk, A., Basabe, N., Páez, D., Reyes, C., Villagrán, L., Madariaga, C., ... Martínez, F. (2016). Communal cop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a context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Spain, Chile, and Colombia. *Cross-Cultural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 50(4), 325–355.
- Wlodarczyk, A., Basabe, N., Páez, D., Villagrán, L., & Reyes, C. (2017).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22(5), 371–384.
- Wlodarczyk, A., Zumeta, L., Basabe, N., Rimé, B., & Páez, D. (2021). Religious and secular collective gatherings,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and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Two longitudinal studies. *Current Psychology*, 42(6), 4754–4771.
- Wlodarczyk, A., Zumeta, L., Pizarro, J. J., Bouchat, P., Hatibovic, F., Basabe, N., & Rimé, B. (2020).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Validation of a short scale and proposition of an integrative meas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1721.
- Xygalatas, D., Konvalinka, I., Bulbulia, J., & Roepstorff, A. (2011). Quantifying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Heart-rate dynamics at a fire-walking ritual. *Communicative & Integrative Biology*, 4(6), 735–738.

- Xygalatas, D., Lang, M., Maño, P., Krátký, J., & Fischer, R. (2024). Emotional contagion in a collective ritual.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36*(12), e24111.
- Zabala, J., Conejero, S., Pascual, A., Zumeta, L. N., Pizarro, J. J., & Alonso-Arbiol, I. (2023). Korrika, running in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rough the Basque country: A model of collective processes and thei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1095763.
- Zabala, J., Vázquez, A., Conejero, S., & Pascual, A. (2024).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identity fusion: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activates fusion with the group over tim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3*(3), 1479–1496.
- Zheng, W., Yu, A., Fang, P., & Peng, K. (2020). Exploring collective emotion transmission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PLOS ONE*, *15*(8), e0236953.
- Zimbardo, P. G. (1969).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7*, 237–307.
- Zlobina, A., & Dávila, M. C. (2022). Preventive behaviour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role of collective rituals, emotional synchrony, social norms and moral oblig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1*(4), 1332–1350.
- Zumeta, L. N., Castro-Abril, P., Méndez, L., Pizarro, J. J., Włodarczyk, A., Basabe, N., ... Pinto, I. R. (2020).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self-transcend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well-being during 8 March demonstra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607538.

Mechanisms of generation,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DUAN Ying, YIN Kel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riginates from Durkheim's social theory and refers to a strong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elicited by collective gatherings. Curr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s not only an intense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but also a process of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and a sense of social bonding and self-expansion that combines a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a sense of the sacre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s prevalent in traditional religious rituals and secular life, and as the Internet has transcended the requirement for group “physical co-presence”, a new form—onli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has emerged.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volves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behavioral, contextual, and individual traits. Existing research evidence consistently reveals that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not only brings about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enhances individual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ut also improves group identity and cohesion and reinforces group norms.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the top-down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convergenc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onli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examine its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and cultural psychological impacts, and consider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Keyword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group identity, social bonding